



徐向前：

在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艰难选择

□少华

1931年，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时徐向前则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这对“搭档”在历史的大潮中决裂，各奔前程：一个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另一个投敌叛变，最后在国外凄凉死去。这里讲述的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拥护中央北上决策，但又不愿将四方面军拆为两半，在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所作的艰难的选择。

徐向前很久以来一直想离开红四方面

军。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在许多问题上根本不征求、不重视、不尊重他的意见,有时还用各种手法贬低他的地位和威信。徐向前感到自己与张国焘、陈昌浩等感情上、性格上也合不来,总是感到压抑、不愉快。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希望借两军会师的机会,能到中央工作,不图升官发财,只求做点事情。

徐向前憧憬着两军亲如兄弟般的合作,憧憬着离开张国焘后的愉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师的欢乐是如此短暂,美好的前景转瞬即逝,两大主力红军出现了裂隙。

曲折的起因是张国焘不可抑制的野心。客观地说,张国焘对于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态度是积极的,会师之前对于中央的指示是尊重和服从的,这从他大力支持嘉陵江战役可以看出来,从他不遗余力地督促部队向川西进军甚至不惜放弃川陕苏区可以看出来,从他积极动员和组织衣物、粮食支援中央红军可以看出来。但是当他了解中央红军的实力,得知一方面军不足2万人之后,他就开始不安分、不平静了。他拥有4倍于一方面军的实力,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主人。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到四方面军慰问。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公开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治委员。因事出突然,又事关大局,李富春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未等中央答复,张国焘又令陈昌浩致电中央:“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与此同时,中共川陕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对于会师后出现的复杂情况,带兵在前线担任开路先锋的徐向前还蒙在鼓里,他还在幻想早点脱离与张、陈搭档的尴尬境地。

一日,他与陈昌浩交谈时正式透露:“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

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陈昌浩一下子怔住了，感到十分突然，急忙问道：“那你呢？那你准备干什么去？”

徐向前诚恳地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

“你先别考虑这件事。”陈昌浩坚决不同意。徐向前并不为陈昌浩的态度所动摇，拿定主意要走。

对于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赤裸裸的要权，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讨论。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将士一同北上，大多数领导同志同意作适当让步。

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对中革军委领导成员进行调整，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3天后，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还作出明确的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上述决定反映了党中央促进两军团结的精神，从中也可以体现出毛泽东过人的气量，张国焘却把中央的让步视作自己个人的胜利。

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

由于两军会师后产生了一些龃龉，特别是张国焘、陈昌浩已分别向中央提出强硬要求，其中也涉及到了徐向前的职务问题，所以，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等人在与徐向前接触时都十分谨慎。但是，他们对徐向前在创建和壮大红四方面军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有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说徐向前是孵化和带大四方面军的“母鸡”。见面时，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表彰他在发展根据地和军事上的杰出贡献。

期待已久的开拔令终于下达了。军委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北进。

对于北上这一大的原则，徐向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明显地拉开了与张国焘的距离。8月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言：“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徐向前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会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21日，右路军分两路通过草地。红军在这里留下累累尸骨。到达班佑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夺取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包座。徐向前鉴于右路军中三军团还未跟上来，位于战斗位置的只有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而一军团又相当疲惫，遂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毛泽东对于徐向前时刻注重大局的精神非常赞赏，批准了他的设想。

包座之战是两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仗。包座之战，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右路军急切地催促左路军火速东靠、并肩闯陇。这时，党内又起风波，实际控制左路军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南下。

“屯兵于此，无异等胡宗南从容布阵来围歼我们。战机一失，北上的路线就会被堵塞，那就只有再退回草地了。唉，那就麻烦了！”徐向前实在不明白张国焘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毛泽东也很着急。9月1日，他与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给张国焘、朱德，详细、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指出这是红军挺进甘南实现北上抗日的最好时机。两天后，张国焘回电，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

中央把劝说张国焘的希望寄托在徐向前身上。徐向前也抱着一线希望。因为过去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川陕，大部分时候是张、陈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陈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作出妥协。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发电给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

不散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就在电报发出的同时，前敌指挥部收到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打来的电报：“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

在这关键时刻，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部队南下，倒向了张国焘一边。

徐向前心里十分矛盾。合兵北进是他的基本思想，所以他此前站在毛泽东的战车上频繁呼唤、苦劝张国焘改变主意，但是最糟糕的是现在必须在北进与合兵两个支撑点中挑选一个。南下固然是他不愿意的，但更令他不愿意的是分兵，他不想看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更不愿看到自己生死与共的四方面军裂成两半。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

毛泽东对张国焘绝望了，但他对徐向前这只养育四方面军的英雄“母鸡”存有希冀。9日晚，毛泽东在率一方面军先行北上之前，踏着星光，来到徐向前住处，在院中见了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由于是在四方面军驻地，由于徐与陈昌浩住在一起，由于四方面军三大巨头都表示过相同的意见，毛泽东的问话听起来有些随意，其实是想看看徐向前最后的态度。

徐向前直言相告：“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指挥。”

毛泽东默默地点了点头，呆了一会，就走了。

红一方面军星夜北行。四方面军到第二天早晨才知晓。徐向前刚刚起床，就听到前敌指挥部乱成一团。先是有人说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后来又发现指挥部军事地图丢失，接着前线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出走。

陈昌浩闻言大惊,吼道:“我们没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

就在这时,前方与红三军团保持接触的部队指挥员又打来电话:“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

徐向前坚定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历史得感谢徐向前。是他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如果枪声一起,两支铁军撞在一起,其后果不堪设想。

张国焘清楚徐向前在四方面军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知道徐向前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为了争取徐向前,张国焘在卓儿碉悍然自立“中央”后,做徐向前的工作。徐向前明确地表示自己不赞成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搞法:“红军与红军还闹什么劲。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了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嘛!”

1935年1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取消张国焘第二“中央”的指示,并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陕北的行动。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要服从于共产国际的指挥。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的肯定,实际意味着对张国焘的否定。1936年1月下旬,在拖了一个月后,张国焘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会上,朱德坚定地提出急谋党内团结和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的观点。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央的决议和朱德的提议,陈昌浩也开始转变。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感到大势已去,只好复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遂引军北上,第三次穿过草地,在陕北与一方面军会合。

(江河摘自《中外书摘》)